

02

寶坻文史資料選輯

第四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天津市宝坻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宝坻文史资料选辑

第四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宝坻县
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1991年12月

封面题字 启 功

封面设计 杨普年

宝坻文史资料选辑

第四辑

编辑者：宝坻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（地址：宝坻县城内广川街5号）

印刷者：天津市宝坻县第四印刷厂

津宝文图字（92）第029号

目 录

根在宝坻	周 璇(1)
(附文) 话说云路街	周 璇(11)
挑水的老艾	周 璇(14)
顶五头唱戏	周 璇(17)
一条洒满汗水的路	孙承禄(20)
从事教育与研究工作的经历	杨世明(29)
我和“一掌金”	张廷瑞(36)
一掌金及《一掌金算法》成书经过	杨 之(45)
回忆宝坻师范讲习所	方玉林(49)
我所知道的宝坻简易师范学校	潘乃鑫(51)
回忆我的母校——宝坻县初级师范学校	厉增礼(56)
全国中师优秀校——宝坻师范	李宝信(64)
宝坻县工商业联合会的组建与发展	白宝珊 张庆华(72)
德义理发店	梁德义(78)
同生照相馆	李玉平(82)
我所知道的宝坻铁厂	杨 芳(85)
缅怀老水文工作者史泽良同志	吴丙中(89)
谈谈我村天主教堂的变迁	李德铭(93)

EA35/20

焦山寺戚炳泉被暗杀事件始末.....骆志安(96)

宝坻风味小吃.....吴振军(99)

宝坻名牌小农具及其他.....柳 絮(106)

对《宝坻解放以前的邮传》一文的质疑和补充.....吴庆余(109)

小资料

秦城烟柳.....(63)

机场与墓场.....(77)

留人庄和留景庄.....(84)

庆丰亨洋行惨案.....(108)

丁仁趾与泉州保障.....(110)

编后.....(111)

根在宝坻

周 赓

我生在宝坻，长在天津，中年以后又移居日本。因此，家乡父老中，除了堂弟和表兄之外，很少有人还能清楚地了解我的身世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几年我回乡探视时，总有一股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摧”的失落感，如果遇上“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”的场面，这种失落感就会更加浓重。

现在，县政协要我写一点简介，我想趁着这个机会，让大家更多地知道我是谁家的子孙。

一、云路街周家的来历

“周”，在中国，似乎算不得大姓。因为，只要你有耐性，愿意下些刨根问底的工夫，总会得出“周姓的祖籍是浙江绍兴”的结论。前不久，有人就在天津的晚报上发表文章这样推测，说：经考证，前总理周恩来和大文豪鲁迅（周树人）的祖籍都是浙江绍兴，而且，同为宋代那位写了《爱莲说》这个千古名篇的大理学家周敦颐之后。

说来巧了，我们这支定居在宝坻城关云路街的周家，据家谱的记载，祖籍恰恰也是浙江绍兴，而且，立谱的始祖就是周敦颐，堂名就叫做“爱莲堂”。传到我这一辈人，已是三十二代了。我因为是长门长孙，按照封建的宗法制度，自然而然地是“爱莲堂”周家的三十二代族长。小的时候，祖父为了“培养”我，以便担当起“上承列祖列宗，下传子孙万世”的族长重任，

常常让我看家谱、背家谱。所以，对祖籍何方，始祖是谁，简直可说是刻骨铭心永志不忘了。记得，我们那部家谱的首页，是宋代大理学家朱熹亲笔书写的一篇长文《周氏族谱序》，文章气势澎湃，书法精湛神奇。可惜，据堂弟们说，那部家谱在文革期间已经焚毁了。

不过，据我的记忆，在那部家谱中，似乎没有涉及周恩来或者周树人的记载。（当然，如果入谱的名字是另外的叫法，自当别论）。所以，尽管我们祖籍都是“浙江绍兴”，始祖都是那个“周敦颐”，却仍然可能是“同祖不同宗”的。伟人的“周”，名人的“周”和我们这家平民的“周”，应该说没什么关系，是不能沾边就上，乱认官亲的。

据说，我们这个周家之所以从浙江绍兴北迁，是因为曾祖的先人是某位名宦的入幕之宾的缘故。在宝坻，近支同宗有四，分别住于宽街、北街、白布市和云路街。住在白布市街的周景伯（就是竹兰斋的东家），我们叫他“三爷”，大概是最近的了。说来惭愧，这四支周氏子孙，似乎没出过惊天地泣鬼神的人物，都是些奔波劳碌的升斗小民，尽管可以标榜一下“与总理同宗，和文豪共祖”，来一番自我满足，但除了“周”这个字相同之外，大概没什么必然联系了。

在日本，我曾经碰见过这样的好奇者：他们仅仅因为我姓周，又在天津长大，而周恩来年轻时恰恰也在天津生活过，就自行揣度，断定“此周即彼周”。这，实在有点可笑。所以，在这里交代一下我们这个周家的来源，似乎是很必要的。

二、曾祖周兆麒字仁甫，是清末的地方官员

从老人们的叙述中得知，我们这个家族，最迟是从我曾祖的父亲那一代起，就来到了宝坻的。据说，原来住在城里，赴任为官多年之后，还乡初期，由于曾祖之妹系御史李子申的儿媳，我

的祖母又是李家的姑奶奶，所以，曾在林亭口住了一个时期，后来才又迁回到城关的云路街。

我的曾祖叫周兆麒，字仁甫。

他在清代做了一辈子地方官。初入仕途，是在直隶延庆州任学宫（一种负责教育和乡试、府试的官员），由于在教化士林、荐贤举能上公正廉明，深受举子们的拥戴和上官的嘉许。数年之后，“承旨钦授”河南夏邑县知县。任满后，转任为获嘉县知县。清末的夏邑、获嘉等地，吸鸦片成风，民疲财困，斗殴频起，我的曾祖不是一味地施行威压，而是不断“深入民间，察其疾苦”，甚至常常“停轿街心，劝诱训化”。因此，在被指定署理获嘉知府的吏部提签上，这样写着：“为官清，治事明，善断疑狱，屡解民忧，化贫乡为富郡，训刁顽成善良，堪称能臣，足当大任”。可惜，天不与寿，曾祖未能等到正式降旨，就病逝任所了。

我们家没有出现过四世同堂的盛时，所以，我不曾见过曾祖。只能从他的一幅画像（在延庆州任上请人画的）上知其轮廓：一位清瘦老人坐在太师椅上，朝珠补褂、花翎顶戴。这幅画，每逢除夕，总要悬挂在堂屋里，接受子孙们的参拜。

小时候，我曾见过，曾祖留下来的一枚二寸见方、四五寸长、用浅黄色玉石刻制的官衔印章，文曰“历任获嘉夏邑两县知县周仁甫印”，足以佐证这段历史的真实。这枚印章，我相信仍在人间，只是我一直寓居海外，无法确知其下落罢了。

曾祖生平的抱负是：“致仕医国，归隐医人，解危济困，救厄消灾。”他除了做官，就是精心钻研医术。凡属医书，只要是珍本，不惜重价求购，和当地名医辩证论治，是他独特的业余爱好。在他遗给子孙的财物之中，比较显眼的是一大箱医学经典。曾祖的医术颇为高明，在治疗疑难病症上有惊人的功夫。我的奶奶曾因流产大出血，昏迷二十多天，遍延名医，均告束手，家人纷纷主张料理后事，独曾祖力排众议，亲自斟酌处方，指挥家下

人等撬口灌药，滴喂米汤，终于夺回生命，康复如初。

我父亲从小时候就在曾祖的熏陶下，对治病救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曾祖的精心教导，使他掌握了独到的医术。

三、祖父周莲一生守业在家

我的祖父叫周莲，字益清、益卿。

他是清末光绪皇帝“废科举，兴新学”后的第一代大学生，毕业于“奉天法政大学堂”。我见过他们这帮“天子门生”的毕业照，一个个脑垂发辫，腰缠荷包，和我们脑海中“大学生”形象简直格格不入。

顾名思义，他们这批人，大概是为准备实行君主立宪而培养的“国之栋梁”。可惜，他的命运实在太不济了，刚毕业，大清王朝就覆灭了。祖父在世时，一提到这段历史，他就颇为幽默地说：“我本来生了个通天鼻子，相书上说，要做官可以位极人臣。可是，小时候挨了一顿打，被撞到门坎子上，把个鼻梁骨给撞折了，官运就掉在坑里了，连累得皇上都被推翻了。”

祖父无官可作，当时的社会又毫无秩序可言，而“治则仕，乱则隐”这句话，又自古以来就被读书人视为行动准则，他便回家乡当起了守业长者。每天用他那蝇头小楷写些“混沌初开，乾坤始奠，清气上升而为天，浊气下降而为地”之类的早期认识物质世界的文章，写完，并不发表，只是自己一遍一遍地念，一遍一遍地改。高兴了，还给我讲上一通何为清气、何为浊气的道理，我听不明白，就只管“嗯嗯啊啊”地答应着。

“创业容易守业难”是祖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现在想来，大概是由于“坐吃山空”的道理使然。因此，祖父自奉颇为俭朴，完全没有“舍人”、“衙内”那种纨绔浪荡的恶习。不嫖不赌，也不大吃大喝，属于那种“二斤酒足喝一个月”的类型。儿媳妇们侍候他十分容易，只要弄点细粮，菜里有点荤腥就打发

得他乐呵呵的。鱼要是大了，肉要是多了，反会招来一通必须勤俭持家的教训。如果，给他做了一只鸡，得先告诉他为什么杀鸡，否则，他便会拍着桌子骂你是“败家子”。他唯一的嗜好是吸“兰花烟”，而且，非南街“竹兰斋”的不吸，天津、北京尽管是大城市，他却认为“繁华之地，优劣混杂，远不如小城老铺品物之纯”。他喜欢坐在“竹兰斋”的店里，一边喝着茶，一边吸着烟品味，一边看着伙计包装。

我的奶奶不幸于1942年早逝，祖父一直的鳏居，由三个儿媳妇照应。尽管大家都懂得“百善孝为先”，但毕竟是封建礼教熏陶出来的，绝不会像日本儿媳妇那样，可以帮着年老的公公脱光衣服，洗净全身，再给穿上睡衣，送进被窝。祖父自己又是满脑子孔孟之道，时刻要维持长者之尊，当然绝不会把内衣之类的让儿媳妇洗；想吃点什么，也不会对儿媳妇们说，生活上的不便可是可想而知的。孙子辈里又是女孩多，除了我这个十来岁的长孙放了学可以说两句话外，整天连个说话的对手都找不到，精神上的孤寂，简直是无法忍耐的。大约是1946年末或1947年春，老人动了续弦之念，在十字街心摆颜料摊子的方某，给介绍了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寡妇。老人怕儿子们反对，一直秘密进行，到了迎亲那天，在院子里摆上天地桌，家人才知道。我的二叔和三叔气极了，觉得那么年纪的老父闹再婚，太丢面子，使子孙无法抬头见人，可是，又怕直接跟父亲吵闹有违孝道，便在大媒方某来催促迎亲刚走进二门的刹那间，突然，一只手执菜刀，一只手揪住方某的衣领，并顺手把天地桌打个稀烂，且大骂方某“蒙蔽老人，谋夺家产”非要见官评理不可。方某虽然敢为朋友谋幸福，却不敢真的去冒两肋插刀的危险，为了保全性命，只好马上去退了这门亲事。从那以后，我的祖父又继续过着那种孤寂难耐的生活，直到1951年冬谢世，才算得到了解脱。现在想来，老人再婚的要求，实在是再合理、再正当也没有的了，根本无可非难。可

是，封建的旧观念蒙蔽了人们的心灵和耳目，竟剥夺了老人应该享受的幸福，这实在可叹！

四、父亲周荫霖当过小学校长，后来成了医生。

我的父亲叫周荫霖。

他年轻的时候，在林亭口担任小学校长。

那时，五四运动刚过了十几年，正是维新思想盛行的时代，全国城乡，到处流行着毁佛兴学的热潮。他，当然是个积极实行者。他们的学校设立在一座寺庙的僧房内，局促狭窄，老师办公，学生上课，都有很大不便。他便发动师生一齐动手“送佛升天”，把大小泥胎全部都拉倒砸烂了腾出殿堂作了教室。有一尊石佛又大又高，摔也摔不碎，砸也砸不烂，不拿掉吧，又显得“革命行动”未能完全彻底。恰巧，学校门口有条流水沟，桥太小，学生上下学有些拥挤，他灵机一动，号召师生说：“佛经上说，我佛慈悲，普渡众生，咱们帮助佛爷完成宿愿吧”，于是，那尊石佛脸朝下，背朝上，躺在水沟上，真正地普渡起众生来了。

一天傍晚，父亲因为太忙，顾不上回家吃晚饭，妈妈便给他送到学校去了，走到桥上忽然觉得桥宽了，低头一瞧，似乎有个人紧靠着木桥趴在那里，吓得她失声大叫，连滚带爬地跑进了学校。经过这么一吓，回家以后，发了好几天烧。从那之后，他们夫妻之间，出现了两个互相埋怨的词汇，妈妈常说父亲是：“欺佛毁庙，祸殃妻室”；父亲则常说妈妈是：“庸人自扰，其愚何之。”

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我国东北，全国上下群情激愤，抗议示威，游行集会，此伏彼起，波澜壮阔。父亲作为一校之长，自然不断号召全校师生共赴国难，抗敌御辱。不料，芦沟桥炮响，日军很快占据了宝坻，并在林亭口派驻了一支部队。大概，汉奸特务事先对宝坻境内活跃而又略有影响的人物，做了调查，所以，日军进占不久，就派人“礼聘”父亲到县任职，父亲以“才浅识薄，难荷重任”为由，拒不从命，同时，陆续安排容易引起敌人

注意的师生离校。日本人恼羞成怒，准备将父亲逮捕，幸好一位李姓亲友，在敌人采取行动的前夜得知确信，急忙通知我家，父亲当即抛妻弃子星夜逃往天津。从那以后，父亲直到去世未再在宝坻生活过。

父亲逃到天津，已是天色欲晓的时刻，只见到华界与租界之间已被日军拉上了铁丝网，虽设有通路，但，要等日出之后才能放行，而且要交验身份证。他想：与其验证被捕，不如孤注一掷。于是，花钱买通了一位熟悉地形者，绕到僻静处，扒开铁丝网钻了过去，这才混入了租界，住了下来。

亲友们都劝父亲重操旧业，有的连学院都给找好了。但，父亲坚决不肯冯妇再为，他说：“教育是启蒙开智、教化人心的事业，在日军铁蹄之下，不灌输顺敌为奴的思想，敌伪必不甘休，若屈从，何以对亲朋父老？还是“青门学种瓜”为好。”所以，后来，一直到死，父亲都是行医为业。

父亲在原来担任校长期间，很能团结同事，爱护学生，使整个学校充满了家庭般的和睦气氛。这种亲情友谊，一直延续到老师们的第二代和学生们走向社会很久很久。父亲在天津定居后，许多学生与他来往密切。女学生杨慧芳1946年前后就入了党，参加了革命工作。建国时，在江西赣州地委，每次写信，都一定把“敬爱的校长”作为开头语；男学生赵××（姑隐其名），解放前，在天津经商发了财，除了年节及父亲的生日必备礼物亲自探望“校长”之外，连大小二位夫人吵架，自己做了“受气的丈夫”之类家庭琐事，都要来问问校长：“您看怎么办好？”；日伪时代，一天，突然有几个警察局的官员，一进院就大呼小叫地喊：“周校长在哪屋住？”原来，女学生冯××（暂略其名）因爱情方面的烦恼，跳了海河，人虽未死，却已意识失明，身上的唯一遗书，是写给“校长”感谢培育之恩的。一位大家都叫他“小王老师”的，在父亲离开林亭口已经七、八年之后，得了肺

结核，去天津看病，那时没有结核医院，他又需要常常透视检查，父亲便让他长期住在我们家里，吃穿住用全由父亲负责。小王老师也像在自己家一样，自由自在，毫不拘束。

说到行医，我的父亲可以说是“票友下海”。早在他当林亭口小学校长时，每逢回城里探家，总有人来请看病。有时，明明看见上午他就走进云路街大牌坊了，却一直到吃晚饭才进家，原来在路上被人截去看病去了。别人看病还有个“脉礼”可得，我父亲看病却常常自己掏钱给人家抓药，还振振有词地说：“我是校长啊，为人师表，那能充大夫要钱呢！”

后来，他在天津行医为业了，一家生计全靠诊费维持，当然不能不要钱了。可是，一遇到贫寒的患者，他总是说：“我送您两副药先吃着，不用另外去抓了”。如果人家不好意思再来求诊，只要知道住址，他会找到人家家里送医送药。记得1945年，我家住在河北区的时候，一个拉排子车的老头，因为遇上连阴雨，没活干，一家人吃饭成了问题，急病了。我父亲给人家开了个药方，上面有“黄白二肥为引，米汤送服，无引不得服用”这么一句。药铺的人不明白这个引子是什么，让患者家属再来问，我父亲给了一张纸条叫去馒头铺找。原来，他趁人家去抓药的空，给买了十个馒头、十个窝头，那张纸是取货凭单。老头的儿子——一个四十来岁的壮汉，跑到我家嚎淘大哭，跪在地上不肯起来。

抗战胜利时，父亲颇为欢欣鼓舞，以为从此国家有望，幸福可期。不料，接收大员们大闹其“五子登科”的丑剧，那点聪明才智，全用到往自己家里搜刮金子、车子、房子、女子、儿子上去了，整个社会被闹得乌烟瘴气。父亲失望了。

解放战争进入决定性的关头，在长城部城工部工作的父亲的老朋友李松云，突然潜入天津，找到家里。在李松云的要求下，父亲开始为他们中转一些信息，接应某些过客。记得，有一天，

刚刚下午，忽然，一位身着将军服的人，带着两个手持盒子炮的卫兵，坐着黑包轿车来到家里，和父亲谈了好大阵才走。父亲送客时，见我在门口，就招呼我回家，可是，一直沉默着，好久才冒出一句话。“你记着，他是李一氓”。是不是现在给宝坻城关中学题写匾额的那位，我就无从知道了。

从1947年冬父亲和李松云见面，到1949年天津解放，中间不过一年多一点，父亲究竟是正式参加长城部城工部了呢，还是只是从旁协助了呢？由于天津解放初期，人员流动极大，而在那以前，各个系统又都是独立垂直的关系互无来往，李松云又一直杳无踪迹，这件事，竟一直没有个正式结论。这，大概得说是个历史之谜了吧！解铃还得系铃人，不知这位李松云是否还在人间？

我父亲八十岁以后，仍然不断有人到家里来求诊，他总是和蔼地接待，细心地治疗，来者不拒。就是自己发着烧，拉着血，身子异常虚弱时，也靠在被子上给人看病。一个神经质的中年妇女，几乎一个星期来三、四次，父亲从不嫌烦。她的丈夫说：从老大夫这儿回去，她绝不犯病。不来，可就麻烦了。

父亲逝世后，所属单位职工有四五百人赶来追悼，就医患者送来的花圈摆满了通道。单位党委在悼词中给作了八个字的结论：“医德医风，有口皆碑”。

父亲的诗文功底颇为深厚，退休之后常和老友们酬唱应和，1983年1月13日，他写了一首题为《傲岁》的自寿诗，似乎是在自我总结，现抄录于下：

形骸虽老气初全，迟羁津沽逾卅年，
半世辛酸留旧恨，一心依愿在新班。
天怜幽草容长健，人共梅花傲岁寒，
最是俗人讲俗例，面条打卤庆平安。

五、我是一个“吃粉笔沫”的，而且从中国吃到了外国

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，我们这个周家，从曾祖时起，经历祖父到父亲，是个向下滑降的曲线。土改时，祖父定了个下中农，两个叔叔则是贫农，父亲呢，因为行了一辈子医，算是个自由职业者。用一句通俗点的话说，是“穷到底儿”了。

可是，物极必反，否极泰来，“慷而慨”的形势，带来了“今胜昔”的结果。父祖无财，天公不弃，历史的发展，又把这一代推回到人们所谓的“仕宦之家”、“书香门第”的行列。我们姐弟七人（四女三男），居然全都因为形势的需要，陆陆续续地毕业于各种大学之门，得到了工程师、主任医师等职称，半数以上成为县团级或享受着县团级的待遇。

建国前，我参了军，当了文化教员，成了一名未成年的军官。立过功，受过奖，出席过大军区的先进代表会议。进入经济建设时期，又以调干生身分进入大学学习。毕业后，为支援地方大跃进，调入哈尔滨市工作。

在哈尔滨工作，成了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

我的妻子是技术员。结婚几年后，我们有了三个孩子。当时，妻娇子幼，工作顺心，生活颇为美满。谁知事有意外，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。

一天，晚饭才罢，忽然，有两位全副着装的民警敲门进来，毕恭毕敬地敬礼如仪之后，郑重地宣布说：“我们奉命正式通知您二位，夫人系日本公民，田中角荣首相交来的名单中有她在内。根据政府指示，夫人可以随时回国”。那时，“到外国去”这个概念，还没进入人们的意识之中，我们被这个消息弄得懵懵懂懂，如呆如痴。

不久，爱人带着三个孩子回日本了。

一个家庭分居两国，当然有诸多不便，孩子上学，生病，以及生活方面的具体事务，都只能通过国际电话谈个大概，无法实

际、具体地解决。三年多之后，经过各方面协商，一位非常著名的“友好老人”趁访华之机，亲自到北京和哈尔滨要人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我到了日本，被安排在大学里任教。课时由少而多，工资待遇也逐渐增高。因为我年纪大，毕业时间长，又是外国人，所以享受特等薪俸，即比大学毕业五十年以上的教授还高一级。

现在，我的孩子，老大、老二都已留学归来，进入了较有名气的公司和社会团体工作，老三即将毕业，工作岗位也已确定。有意思的是：我们一家人的工作都和中国有关，都是在不同领域负责或兼管中国事务。不用说，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，促使中日关系向着日益友好的方向发展。

坦率地说，宝坻，在我三个孩子的工作领域里，还是挂不上号的小地方，可它毕竟是我的故乡，只要有可能，他们一定会体尝“亲不亲，故乡人；美不美，家乡水”之乡情的。用一句不大动听的话来说：只要有一个后门可开，就得开给宝坻！

〔附文〕

话说云路街

周 献

“云路”，是宝坻城里的一条小街，南通东街，北向文庙，两侧整齐地排列着三十几户人家。这，就是我的祖居所在。

过去，住在这条街上的，大多是所谓的“书香门第”。这，大概是因为既处“圣人”眼下，又登“青云之路”，预兆颇佳之故吧。可惜的是，尽管是这个吉利的所在，有史以来，却只出现

过几位可怜的“孩子王”，名宦、大儒，一直渺无踪迹，当然也就没什么大富大贵，人们只是守着祖业、拼着汗水，过着衣食粗安的日子，以“家道小康”自慰。

那时候，人们日常食用的米面，全靠自己加工，所以，差不多的人家都有碾子、磨。有的人家养着驴，大部分人家抱着磨杆推。没有磨的，或逢年过节、红白喜事需要量大自家磨不够用，就临时现借。借磨，用完了，要留一升米面“压磨”；借毛驴，用完了，要喂饱、饮足、溜透，附上一簸箕糠麸送还。这，是妇女们的工作，所以，当时常见的街景之一，就是年轻的姑娘、媳妇们搬着粮食来来往往，或嘻嘻哈哈地就磨礼推推让让。

我家有磨，但三房吃饭，需要量大，有时候赶到了一起，也不得不借别人家的用用。我小时候，常常和姐姐们到对门张家借磨。

这是个殷实之家，生活水平在当时算是说得过去的。由于大门向着东方，而住房是座北朝南之故，所以，进了门是一条狭长的过道，过道的右侧，是他们居住的小四合院和一个设置着仓库、磨房和堆放柴草的跨院。借用他家的磨，有一个特别的好处，就是不用经过主人的住屋的窗下，免去许多客气话，只要对着小四合院喊上一声，就算礼到了。

俗话说：“远亲不如近邻，近邻不如对门。”张家和我家的关系非常亲密，离开故乡几十年之久的今日，我还记得，他家的正房是一明两暗，堂屋里盘着锅台，安置着水缸、碗柜。可惜的是，由于他家没有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，而且在邻里排比关系上比我们长一辈，张家人的模样，我倒记不真切了。

去年回故乡，刚下车不久，来了一位中年妇女看望我们，堂姐介绍说：“这位就是对门张家的老表姑”。这可真是：竹马送别，霜鬓还家，不由得令人慨叹了一番人世沧桑。闲话中，谈到了常去她家借磨的旧事，她感慨万端地说：“现在，大家都吃供